

前山高处指南环  
——关于澳门的往事杂忆  
□欧初

最近，我又访问了中山、珠海等地，见到许多当年共同浴血奋战的老战友。谈到还有一年左右，澳门就要回归祖国，大家都感到由衷的欣庆，多年来我亲历的关于澳门的件件往事不由浮上眼前。

记得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邓小平、罗荣桓、刘亚楼等首长来广东视察，省委派我陪同他们前往中山、珠海等地，沿途向他们介绍了中山、珠海、澳门一带的历史和现状。当时新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 50 出头，精力充沛，言不轻发，而听取介绍时专注异常，虽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陪他在广东视察，此行给我留下的印象依然非常深刻。到了前山，登上海关三楼，从这里眺望过去，澳门的南环一带山川城郭历历在望，往来行人以及对方的哨兵依稀可见。此时此刻，邓小平总书记、沉稳温和的罗荣桓元帅、英发机敏的刘亚楼上都没有多说话。80 年代中期，当中英、中葡相继签署联合声明，香港、澳门即将回归之际，我写了一首诗追记此行：

功成相庆主权还，马列常青独创艰。  
忆昔邓公曾注望，前山高处指南环。

没人能够断定，“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此时已在这位世纪伟人的脑中发轫。但是这几位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曾率领雄师百万挥军万里的将帅，看到祖国的领土上仍飘着异国的旗帜，站立着异国的士兵，胸中必然荡起不息的波澜。20 年后，当邓小平同志作出那高瞻远瞩的决定之时，这次前山之行所见，想必会闪过他的眼前。多少年来，中国的历代仁人志士，都把收回包括香港、澳门的全部领土列入自己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人更是为此付出了前无古人的艰苦努力和巨大牺牲。但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只有国家强盛，统一国家的目标才能够得以实现。

我是中山人，对澳门这个本来就属同一县治、满街都是中山乡音的城市一直都不陌生，从来将之视为故园之一部，直到现在，我还担任澳门中山同乡联谊会名誉会长。全国抗战初期，广州沦陷，我随家人曾小住澳门。战火之中，家境十分艰难，为了联系抗日团体，我从澳门乘船赴香港，不料因缺 20 元港币而不许上岸。警察不由分说，将我押上囚车，直到日暮时才由同学林家潼君保出。而到 1977 年，我与时任广州市市长梁灵光访问港澳，所受礼遇与昔日相较真有天壤之别。当时的澳督专门设宴招待我们，还向我俩各赠一个以澳督府为背景的纪念品。抚今追昔，令我感慨良多，遂赋长诗《述怀》一首，中有四句：

督府筵开迎上客，杯中忧乐岂杜康。  
神州早见人间换，此番访问赖国光。  
席中，澳督对我表示敬意，称赞我是抗日英雄。

就我的理解，澳督这番话，并非只是对我个人赞誉，而是对全国抗日战争期间珠江纵队为珠江三角洲和澳门所作贡献的肯定。

珠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而珠江纵队第一支队（以下简称珠纵一支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主要在现在的中山、珠海两市，毗邻澳门。自 1943 年起，珠纵一支队的前身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开始在日、伪、顽军环伺的五桂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多次突袭敌人，杀敌除奸，抗日声威不仅震动了中山全县，也在澳门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是中立国，因而澳门算是中立地区。日军并未派兵占领澳门，但澳葡当局受各种势力的挤迫，加上境内经济动荡，治安混乱，走私盛行，日子很不好过。澳门虽为外国强占多年，然而澳门同胞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爱国抗敌之心与内地人民同样炽热，都愿意为驱除日本侵略者出力。全国抗战初期，当地的社团组织十分活跃，广

泛发动群众捐款。组成回乡服务团，对珠江地区的抗敌斗争支援很大。

我游击队了解澳门的情势，俟根据地初具规模，我们就先后派郭宁、冯彬、郑秀、黄乐天等同志赴澳门，建立了秘密的办事处，散发游击队的宣传材料、战斗捷报等，动员当地青年参军。逐渐，一批批的澳门青年来到五桂山，参加抗日。我游击队专门为这些青年开办训练班，代号为“纽约桥”，参加训练班的澳门青年有20多人，其中有李成俊、赖冠威、郑诚之、刘光普、周宇、卢萍、陈君芝、朱碧、郑汝钿、郑秋、任艳华、李铁、郑兆平、任惠莲、胡兆基等。梁奇达、杨子江和我经常去训练班上课。这些青年从训练班结业之后，有的到连队担任文化教员，有的到班上担任政治战士，负责宣传鼓动工作，还有的成为医护人员。这些青年大多有文化，他们参加游击队之后，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为国家民族作出许多贡献。李成俊后来担任澳门日报社长、全国政协委员。

当时我们很注意同各界人士建立广泛的关系，赢得各方的支持。澳门著名的招兰昌医生同我县行政督导处主任阮洪川是少年同学，我们利用这一渊源同招医师保持良好的联系。柯平长期在澳门进行爱国活动，在澳门一带威信甚高，他每年到东江游击区向广东区委汇报工作，都取道我五桂山游击区，由我们护送到东江。著名爱国人士何贤当时同我虽未谋面，但已经多有往来，何先生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我游击队。解放后我们终于见面，何先生见后一直称我为“神交”。20世纪80年代初我重访澳门，还专门到何先生墓前凭吊。从这些爱国人士中，我们逐渐了解到澳门政府和敌伪顽之间的各种矛盾，决定抓住机会，开展对澳葡当局的联络。

1943年底，我根据地内的一个小山村叫石门路，该村有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堂。一个外国人安神父，是从澳门天主教会派来此地传教的，我游击队派人同安神父交谈，了解到他同刘帼超医师是好友，经常有往来。刘医师是一位天主教徒，全国抗战前就从澳门到三乡行医。她思想进步，同情我军，多次义务医治我游击队伤病员。安神父在山区期间，恰逢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成立。他亲眼见到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景象，对我游击队的好感也大为加深。不久，安神父要回澳门，我决定通过他设法打通同澳门当局的联系。

我找来同刘帼超医师也很熟悉的郑永晖同志（他后来任谷镇区长），让他护送安神父回澳门，并设法将我写的一封信递交澳葡当局，表示如果日、伪进犯澳门，我军愿予以支援，同时希望他们与我们加强联系，互通情报。我交待郑永晖，这件事对团结国际友人、争取外援意义重大，务必做好。

郑永晖即陪安神父到三乡刘帼超医师处。经过说明来意，和刘帼超做安神父的思想工作，安神父表示乐意支持，然后再转道赴澳门。安神父一到澳门，就将我的信转交给澳葡当局。澳门方面由警察局政治部的葡籍慕拉士秘书长出面热情款待郑永晖，对我军极表感谢，并承诺加强联系。郑永晖此行的搭桥目的也就达到了。

此后几个月中，我游击队数次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还多方出击，取得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战果。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逐步走上轨道，还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建立了多个税站。而澳门则受到越来越多的伪军、土匪的骚扰，澳葡当局武装力量单薄，难于控制局面。因此，澳方试图取得我方的助力。经过了解，他们找到一位当时旅居澳门的黄槐先生。黄先生原在国民党中山县政府任职，在中山、澳门都有一定的声望。他是我一位亲戚的朋友，早年我在中山各地宣传抗日时见过他，算得上是旧交。黄槐通过我们三乡税站传一个口信，说澳门的警厅厅长有事找我。我觉得事关重大，遂即向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汇报请示。指挥部经研究批准我们派人到澳门谈判。于是杨子江同志以我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黄槐的信，略道契阔，并赞扬他同情支持抗日，同时介绍经济委员会的秘书长梅重清同他接洽。8月，梅重清持信到澳门见黄槐，随后由黄出面安排，同澳方代表慕拉士会谈，澳葡当局要求我方配合维护澳门外围治安，打击骚扰澳门的伪军、土匪，我方同意他们的要求。同时，澳方也作出三点承诺：一是同意我方在澳门进行不公开活动，包括发动募捐筹款等；二是同意我方在澳门采购

部分物资，包括子弹、药品、通讯器材等；三是同意我方送部分伤病员到澳门就医，慕拉士还专门托梅重清带了3块游泳表回根据地，其中一块指定送给我。20世纪40年代，游泳表还很少见，战争期间更为难得，澳方可能想藉此表示他们对合作的重视。我收到这3块表之后，全部上交给指挥部了。以后，澳方遵照协议，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我方在澳门募捐，不仅募得捐款，还得到一批急需的药物，澳门镜湖医院救治我方送去的重伤员，还为游击队培训了一批医护人员。

1945年初，有两个澳门人来到凤凰山区。这里就在澳门的外围，我游击队之一部在此活动，番号为“白马队”。那两个人找到我们的部队，自称是澳门政府的人员，直接奉澳督的秘密命令而来，求见谭生队长。一见到谭生，他们就表明来意，当时澳门的治安极乱，抢劫、杀人的案件很多，经查证，多次的作案其实是同一班人，这帮匪徒的头子外号叫“老鼠精”，是香洲人，身有武艺，枪法很好，被“挺三纵队”收罗于羽翼下。他后来投敌，搜集我方的军事情报，成为臭名昭著的特务。他又纠合一帮歹徒，在澳门作奸犯科，专门抢劫当铺、金铺。一旦遇到警察，匪徒即刻开火。他们行踪飘忽，有时在澳门，有时在中山，加之武器精良，令澳门的警察束手无策，直至惊动了澳督，必欲生擒之而后快。

经过研究，我们认为对这个刻意与我军为敌，又猖狂扰民的汉奸特务应予以坚决打击，何况我们可藉此巩固同澳葡当局的互助关系，遂通知谭生同意澳葡当局的要求，同时要求澳方帮我们捉拿一个名叫郑实的通敌份子，此人平日匿居澳门，一有机会就破坏我游击队的活动。不久，我谭生部智擒了“老鼠精”并将其移交给澳门当局派来的探长，澳葡方也如约将郑实交给我们。

澳葡当局对我方的合作十分满意，对我游击队的力量也更有信心。他们派人来五桂山，我在石门的贺屋村接见了客人，他们建议设立电台，加强联络，我们也同意。后因形势变化，此事未成。

在澳门珠江口一带活动的黄公杰卖身投靠日本侵略者，出任日军驻澳门地区特务机关的首脑，手下纠合了五六百名歹徒，在澳门横行霸道，又在海上大肆抢劫，身兼汉奸、特务、匪徒、海盗，澳葡当局对他又恨又怕。1945年8月中，黄公杰一伙被东江纵队海上部队俘虏缴械。此时，我珠纵一支队的部分队伍正在东江地区活动，东纵遂将黄公杰移交给给我们，由梁奇达、杨子江处置。其时我也由珠江过东江，连夜提审了黄公杰，然后由阮洪川将其引渡返澳门伏法。消息传开，在澳门一带引起震动，当地政府民众握手相庆之余，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更加敬佩。

多年来，每当我回想起有关的件件往事，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澳门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尽管被外国殖民主义者统治多年，澳门人民对祖国的赤心未改，祖国也从来没有忘记澳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坚持抗日战争。而我珠江部队，更在自己还不强大的情况下，不畏艰险，为使澳门免于战乱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所有这些，都为澳门战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根基。

如今，在“一国两制”的光辉旗帜下，继香港之后，澳门也将回归祖国，中华民族的历史呈现出空前未有的光辉。可以预见，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统一、稳定、繁荣的中国一定会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选自《中山党史》1999年第1期）